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诗人革命家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刘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学与当代史书丛

丛书主编
洪子诚

诗人革命家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刘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 刘奎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ISBN 978-7-301-30209-5

Ⅰ. ①诗 … Ⅱ. ①刘 … Ⅲ. ①郭沫若（1892-1978）—人物研究
Ⅳ.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1306 号

书　　名	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SHIREN GEMINGJIA：KANGZHAN SHIQI DE GUO MORUO
著作责任者	刘　奎　著
责任编辑	饶莎莎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209-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883
印 刷 者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960 毫米　16 开本　27 印张　380 千字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代　序　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的彼此敞开

吴晓东

大约十年前，我曾分别向自己的两位导师孙玉石先生和钱理群先生请教过一个问题：如果从作家论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上哪位作家还有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记得孙老师的答案是老舍，而钱老师选择的是郭沫若。

钱理群老师之所以选择郭沫若，看重的是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典型性、复杂性和无可替代性。这种典型性、复杂性和无可替代性差不多在郭沫若生命历程中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有鲜明的体现。所以当刘奎设计博士论文的选题，试图研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的时候，我欣然表示赞同，并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刘奎或许可以挖出一个高含金量的富矿。这种预感终于在他的博士论文《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中得到证实。

进入这个选题伊始，刘奎不是没有过犹疑甚至动摇。在当时论文的后记中，刘奎写过这样的一番话："博士毕业论文最终定题为'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还是让我不无顾虑。除了学力的问题外，更让我担忧的是，作为改革的一代，或者说八零后，我们真的还能理解那一代人么？我们又能站在哪个位置与他们对话？他们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真的还有意义么？更何况郭沫若又有些特殊，'文革'期间他的政治表态使他往往容易遭致物议。以至于在跟别人谈及郭沫若时，任何人似乎都有资格指责他一通，而不需要阅读他的任何著作。在我看来，与其做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倒不如尝试着去理解，即便不同情，最起码也可做到历史

地去看待他们。”[①] 我从中感受到的是，刘奎研究郭沫若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他这一代人所身处的“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他首先直面的问题，是他所隶属的一代年轻学人是否还能理解以及应该如何理解郭沫若这样的具有相当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的革命作家。而直面郭沫若的复杂性以及丰富性本身，或者把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为一个前提性问题，构成的是刘奎所应对的基本课题，背后牵涉的是一代人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本身这样的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大课题。而刘奎之所以选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还因为这一历史时段的郭沫若“不仅回应了‘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复杂性，而问题的丰富性则或有过之”。我欣喜地看到，随着刘奎研究的渐趋深入，一个更具复杂性和丰富性的郭沫若终于呈现在刘奎的笔端。

20世纪40年代的郭沫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体现在，相对于“五四”时期浪漫的文学青年，“抗战时期的郭沫若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者、政客乃至传统的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他所理想的人格状态。这种现象本身就对我们的新文学史观提出了挑战，这除了旧体诗词要求更为开放的文学史观外，还在于他的历史剧、历史研究所展开的，新旧之间在抗战语境中的新的对话”。而刘奎需要处理的独属于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更核心问题则在于，“郭沫若如何以这种身份机制应对抗战与建国的时代问题，对于我们面对当代问题有何历史经验”。

正是基于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问题意识，刘奎试图将作家论与文学社会学结合起来，并为他自己的研究设计了一个“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进而考察战时郭沫若的各种身份和表达与时代问题之间是如何彼此展开、相互作用的。而刘奎透视历史中的人物的一个贯穿性的视角，是集中分析郭沫若的“人格形态”，从而直面而不是选择规避郭沫若研究史中的重大议题。刘奎的基

① 此代序所引用的文句，若无另行标注，均引自刘奎2015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原文。本书以该论文为基础，对结构、内容和文句表述均进行了修改与完善，特此说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判断是，虽然郭沫若抗战时期各种角色都尽其所能，“但从主体性的视角，他此时的人格形态，依旧受到浪漫美学主体的制约，是一个诗人革命家。诗人革命家不仅为他多元的人格提供了整体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问题和方法”。

所谓的“问题与方法”，在刘奎的研究视野中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郭沫若以诗人革命家的身份介入了抗战时期的革命与建国想象；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机制”，郭沫若的人格形态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因应与回溯了中国文化与政治传统。首先，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深刻介入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和历史进程的“诗人革命家”而言，其核心关怀与诉求无疑是自身的文学表达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战争浪漫主义一度让他对战争充满了乌托邦幻想，但他最终将浪漫转化为了民众动员的力量、革命主体再生产的条件，从而使浪漫主义从文学的消费转向了社会领域的创造动能”。而更为重要的是，“浪漫”在郭沫若身上不仅仅呈现为诗人情怀，也决定了郭沫若以情感动员为基本方式的政治表达路径。刘奎着重分析的郭沫若“由情以达意”的动员方法、演说的表达方式、“情感教育剧”的美学形式，以及对苏联的乌托邦想象等均可归入此一路径。其次，刘奎也花了大量精力探讨郭沫若诗人革命家的身份机制在战时所得到的传统的支援：“虽然是激进的新文化代表，但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并与革命耆旧、文人名士多有唱和，这不仅是源于‘旧形式的诱惑’，也是基于文化救赎、社会交际的需要。但其独特处在于，他在分享‘南渡’等旧体诗词传统以因应民族危机时，其革命家的历史视野则让他从美学救赎转向了历史救赎。”

也正是通过“历史救赎”的观察角度，刘奎把郭沫若与传统的关联性进一步推溯到“士大夫文化”流脉。在刘奎看来，兼及“政、学、道”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不仅为郭沫若的诗人革命家的人格形态提供了依托，更为其功业或革命理想的实现指示了途径，尽管其在应对政党政治的现实格局的过程中不无曲折。譬如他效法廖平“托古改制”的方式，将孔子思想阐释为儒家人道主义，即可视为郭沫若为革命重塑道统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却遭到了政党政治的非难；再譬如，虽然现实的革命政

权也亟须确立新的道统，中共还通过“寿郭”活动将郭沫若确立为鲁迅的接班人，但郭沫若“崇儒贬墨”的文化思路最终还是导致了左翼知识分子及党内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不满；同时，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又因有“为匪张目”之嫌，而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刘奎的这一部分研究充分揭示了郭沫若历史想象和历史研究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也揭示了郭沫若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政党政治由此构成了影响郭沫若战时文化政治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政党堪称是现代的君主，郭沫若要实现革命理想，也需借助于政党之“势”。刘奎写作中的历史感也正表现在对郭沫若与政党政治的纠结关系的辨识：郭沫若对“文艺如何动员民众”的持续的思考，回应了国民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中共发动“寿郭”及戏剧运动后，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写作开创了左翼文化政治的新形式；而在“宪政”运动期间，郭沫若又以无党派身份参与其间，为“建国”大业积极奔走，“这是郭沫若革命理想与实践的经与权，也呈现了40年代的历史开放性”。

“经与权”的辩证，是刘奎总体把握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的一个核心而独特的线索。在刘奎看来，抗战时期郭沫若虽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或政治身份，但对革命却未曾须臾背离。无论是写诗、从政、诗词唱和、戏剧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郭沫若在充分释放他的诸种身份所蕴藏的能量的同时，并未外在于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在各种身份形态之间频繁且裕如地转换，都可以视为作为一个诗人革命家的“权变”。刘奎指出：“这种独特的经与权，是他与其他文化人或革命者的不同处。如果借用狐狸与刺猬这两种知识分子类型来看郭沫若，我们可以说，他看起来像狐狸，但实际上却是刺猬。……对于郭沫若来说，浪漫主义的诗化人格，是他多变的一面，而革命或历史精神则是他的统摄原则。也就是说，他身份上的改变，正是为了因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自我调整，是为了更为有效地介入现实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因此，诗人革命家的身份为郭沫若提供了切入现实问题的方式，他的诗人、学者、剧作家等不同身份，均可视为诗人革命家在回应时代问题时的具体形态，从而使他能与社

会、文化、政治等取得有机关联。”刘奎的这些体认，都有助于深化对郭沫若形象以及历史作用的理解，也同时意味着一个历史研究者向历史语境的真正敞开中所获得的一种开放性视野。

正因如此，我尤其欣赏刘奎下面的表述中所体现出的作为一个年轻学人难能可贵的自觉意识：“这种开放性，又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和历史想象提供了条件。因而，诗人革命家不仅是郭沫若参与时代的方式，也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视角，它开启的是一个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有机状态。这对于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学术的体制化等现象，都不无借鉴意义。”也许，通过郭沫若研究，刘奎自己也逐渐开始找到一个研究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有机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也就有可能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历史想象”的层面，同时历史也通过它的研究者有效地介入了当下的时代和进程，成为当下的研究者以及当下的社会总体感受历史的一个既动态又开放的视角。而这种研究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或许暗含着某种方法论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过往的历史由此获得的是一个动态的主体性，从时光尘封的故纸堆中被当下的研究主体唤醒，彼此在互证的过程中各自找到了表达的有效途径：历史通过研究主体获得表达，而研究者也通过被他唤醒的历史主体获得了向历史同时也就是向未来远景敞开的视野，正如刘奎隐含了内敛的激情的下列表述：“我们之所以重新回到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将他彼时各种身份、表达与时代问题加以考察，并非是要为这个时代增加一个分裂的历史主体，或一堆难以拾掇的历史碎片，相反地，我们试图将郭沫若的每一种身份、每一种表达，都视为一种切入社会与时代问题的方式，或打入历史内部的一枚楔子，从整体上呈现一个与社会、历史有着密切关联的、有机的主体。这是本书的整体视野，也是我们回顾郭沫若的初衷，即为了打捞这种历史经验——尽管它往往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他所开启的可能性，如主体与历史、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联，都值得我们再度回顾。这也是处于‘后革命’语境中的我们，重拾郭沫若的某种不得已的途径。”

刘奎的研究中鲜明而自觉的当下意识也正在此。通过他的研究，郭

沫若这一在“后革命”语境中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真正获得了历史性，也从而获得了当下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研究主体与历史人物彼此敞开、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历史人物或许就永远化为“历史”而无法成为后来者的可堪鉴照的历史之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堪称是擦拭历史之镜的工作，也无异于为当今的社会总体提供照亮历史通道的折光，因此，这样的历史研究也是直面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而刘奎对“诗人革命家”的形象设定，也使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郭沫若显示出独特意义，最终事关我们对文学史研究的本体价值的体认。正像刘奎在余论中引述郭沫若在1943年所说的一句话：“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在郭沫若的这一表述中，“史剧家”也可以替换为“文学家”。虽然史学家和史剧家都关乎“历史精神”，但是在郭沫若眼中，史剧家是在“发展历史的精神”，这种“发展观”或许也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独特的历史研究取向。这也正是刘奎强调郭沫若身上所禀赋的一以贯之的浪漫主义的意义：“更为关键的是，郭沫若是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有机体观念、宇宙的目的论等，都从精神和观念的层面强化了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精神。”其实，对于一个诗人革命家来说，郭沫若或许并不满足于所谓对历史精神的强化，而更渴望的是对历史精神的“发展”，而正是这种“发展”，许诺的是一个文学家对历史的具有主体性的介入，同时也就指向了历史发展中的现实进程，进而蕴含的是历史的未来维度。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刘奎的这部书稿几乎完全基于第一手资料。在答辩会上，孙玉石老师特别指出，全书三十几万字，上千条注释，没有一个注取自《郭沫若全集》，而是全部来源于原刊和初版本。说到此处，孙老师颇为动情：“我为北大中文系骄傲。”孙老师的这句话一时间也令我动容，眼里禁不住有些湿润。也许我当时的感受是，刘奎的学风至少得到了我所尊敬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的认可，我由衷地希望并且相信这种认可会成为刘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持久的动力。

（2016年7月12日于北京上地以东）

目　录

代　序　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的彼此敞开……（吴晓东）1

绪　论……1

历史与叙述……1
从“第三个十年”到“抗战时期”……11
诗人革命家……21

第一章　“由情以达意”：浪漫的情感政治学……33

浪漫如何介入历史……35
“由情以达意”：文艺如何动员民众……61
政治修辞术（上）：演说及其仪式……82

第二章　诗词唱和与士大夫情怀……103

书拓与诗词唱和……107
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132
唱和传统的现代嬗变……155
结　语……177

第三章　屈原：一个文化符号的生成……183

政治修辞术（下）：诗人节与新诗人的诞生……184
情感教育剧：《屈原》的诗学政治……206

剧可以兴：《屈原》作为诗化戏剧 …… 224
屈原形象的变与不变 …… 241

第四章 学术研究的历史想象力 …… 257
历史想象的分歧：郭沫若与墨学论争 …… 258
革命士大夫的学、政与道 …… 276
知识与革命：《甲申三百年祭》的比与兴 …… 297
结 语 …… 313

第五章 文学、制度与国家 …… 315
制度的风景 …… 317
有经有权（一）：郭沫若对毛泽东文艺的评介 …… 342
有经有权（二）：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建立 …… 363

余 论 回到历史中的郭沫若 …… 383

参考文献 …… 393
后 记 …… 4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历史与叙述

1948年寓居香港期间，郭沫若开始写抗战回忆录。因资料缺乏，郭沫若只能“全凭自己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大体上只写了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事”[①]。即便如此，郭沫若也写了十多万字，以“抗战回忆录”为题，连载于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在后记中，郭沫若告知读者，以后将续写他在重庆的经历。由此可见他抗战时期生活的密度，以及他本人对这段历史的重视。

此前郭沫若已写有不少自传，如《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创造十年》等，对于如何写自传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在1929年出版的《我的幼年》的前言中，他写道：“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②]他不仅试图为自己立传，也意在为时代立传。《抗战回忆录》也是如此。

在这篇回忆录中，郭沫若写的是他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及长沙等地的过程，可以说是他抗战时期最为忙碌的一段经历。抗战初期，郭沫若的精神状态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当时与他来往较多的夏衍，就“明显地察觉到郭沫若对他自己今后的工作，还没有打定主

① 郭沫若：《告读者——〈抗战回忆录〉后记》，《华商报·茶亭》1948年12月5日，第二版。

② 郭沫若：《我的幼年·前言》，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第2页。

意，在性格上，他依旧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他为‘请缨、投笔’而‘别妇抛雏’之后，在抗战激流中，他的情绪却是不稳定的”[①]。上海沦陷前夕，他南下香港，准备下南洋找华侨筹款；后来又回到广州，为恢复《救亡日报》奔走。正当他为是否要继续南下募款游移不定时，陈诚从武汉发来电报，谓“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②]，这才结束了他无政府主义式的抗战行动。

回忆录虽然是个人经历的记录，但对他抗战初期的苦闷心态着墨不多。他详细记述的，是他主持第三厅时的工作概况。“第三厅”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国军队之有政治部之设，始于国民革命期间的广州革命政府，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产物，其目的是以党权节制军权[③]。北伐时期，政治部曾发挥相当大的效力。据郭沫若回忆，当时归顺的北军，大多主动要求增设政治部，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部是南军跟北军的根本区别，南军之所以能取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政治部之设[④]。郭沫若的从军经历也基本上与国民政府的政治部相始终。北伐伊始，他就进入政治部，担任总司令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武汉期间，已升任政治部副主任，领中将衔，在邓演达不在时代行主任职权，后一度为蒋介石任命为南昌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民党的党统，因此，当他发现蒋介石有与武汉政府分裂的嫌疑时，才会以党的正统自居，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等檄文。国民党清党之后，鉴于政治部的“左”倾色彩将其取消。南昌起义以后，郭沫若在缺席的状态下，依旧被起义者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因此，当邓演达被暗杀之后，郭沫若可能是除周恩来之外，从事政治工作资历最著者。因此，抗战之际，陈诚恢复政治部后，便向蒋介石力荐郭沫若。陈诚在致蒋介石的信

---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86页。

② 郭沫若：《南迁——〈抗战回忆录〉之一章·六 “拍拖”》，《华商报》1948年8月30日，第三版。

③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④ 郭沫若：《武昌城下》，《宇宙风》1936年7月—1937年2月。

中这样写道："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诚，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①]

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后，一度也想有所作为。这从他网罗的人才便可略窥一斑。因掌握着人事自主权，他邀约了一大批社会文化名流，这包括田汉、胡愈之、郁达夫、洪深、杜国庠、史东山、郑用之、应云卫、冯乃超、沈起予、傅抱石、冼星海、蔡仪等等，皆一时名彦。因此第三厅时有"名流内阁"之称。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人虽倾向左翼者不少，但中共党员却甚少，大多是无党派知识分子，连阳翰笙也表示："在三厅，共产党员只有极少数。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②] 所谓进步人士，也就是当时的中间力量。在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也确实办过几件大事，如第三厅成立之初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纪念周等，有些活动甚至得到蒋介石的亲自过问，郭沫若也因此一度成为蒋的座上客。同时，第三厅是宣传机构，它对战时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对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都有所贡献。它不仅在后方设置了多个文化服务站，还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支抗敌宣传队和三支电影放映队，分赴不同战区进行抗战宣传与动员活动。可见，郭沫若及其领导的第三厅，在抗战初期，是较为深入地参与到了抗战这一历史事件之中的。

虽然从抗战的角度，这是郭沫若较为光彩的历史，是他真正有功于抗战的时代，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某段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这一度又是需要被屏蔽或选择性遗忘的部分。因此，郭沫若的这一段较为丰富的历史，学界的研究反而较为薄弱。不过这段抗战史，其被遗忘的命运，在郭沫若的自传叙述中其实已初现端倪，在《抗战回忆录》中，他就已经开始为这段"光彩"的历史辩解。他不仅将担任厅长描述为周恩来的旨意，而且把同僚康泽（第二厅厅长）等人描述为抗战事业的破坏者，

① 陈诚：《函呈为筹组政治部事敬陈人事运用之所见》，《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来往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296页。

② 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对蒋介石、陈诚也加以丑化。如对陈诚——这位昔日的战友和他进入第三厅的举荐者，他的评价是："其实这位以剿共起家的武人，他懂得什么政治，更懂得什么文化呢！……他不过是傀儡师手里的一个木头人而已。"[①] 实际上抗战时期郭沫若与陈诚相交甚笃，他不仅常去陈诚的战区慰问，他恢复政治部的提议，也是由陈诚向蒋中正传达，而蒋要会见郭沫若，也是通过陈诚转达。不几年，郭的叙述却呈现如此大的差别，可见他写作回忆录时的立场选择及意识形态色彩。1948 年写作《抗战回忆录》的郭沫若，与此时大量前往香港的文化人一样，是由共产党有组织地转移过去的政治与文化资本。与中共军事的推进相一致，此时聚首在香港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展开了文化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工作[②]。除了邵荃麟、乔冠华等人对胡风的批判外，郭沫若也写出了《斥反动文艺》，对朱光潜、沈从文与萧乾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激烈批判。写于此间的《抗战回忆录》，难免印上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试图通过叙事，为自己的历史寻求某种合理性。随着共产党军事的顺利推进，这批左翼文化人同年便被转移至东北，等待参加中共正在筹备的"新政协"。当郭沫若、李济深等人秘密登上北上的轮船时，《抗战回忆录》尚在连载中，但郭沫若却再也没有机会兑现他续写重庆经历的诺言，《抗战回忆录》是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自传。

然而，在郭沫若去世之后，他的这个承诺却有人替他完成了，这就是 1982 年出版的《郭沫若在重庆》一书[③]。该书是一本资料集，也正因如此，它以较为客观的方式显示了郭沫若在重庆期间的抗战活动。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之祝词、纪念活动"，编者辑录了当时报纸杂志上的纪念文章、祝寿诗词及新闻报道等，全面再现了这一活动的盛况。这次纪念活动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它包括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 25 周年、庆祝郭沫若 50 寿辰以及话剧《棠

① 郭沫若：《低潮期——〈抗战回忆录〉之六章·一　邓演达再世》，《华商报·茶亭》1948 年 9 月 28 日，第二版。

② 相关研究可参考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7—50 页。

③ 曾健戎编：《郭沫若在重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棣之花》《屈原》的演出等内容。也正是在这次活动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头版位置发表了《我要说的话》这一代社论性质的文章，奠定了郭沫若成为继鲁迅之后的左翼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这直接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史的叙述[①]。同时，这次文化活动的意义还在于，它展示了文化如何运动这一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新的展开，尤其是在政党政治的参与下，文化运动如何从自发转向政治组织，文化人的激情如何被转化为政党斗争的社会力量，政党的文化政策如何影响都市文化的生产，以及文化人所面对的政治归属等历史问题。《郭沫若在重庆》的第二大主题是郭沫若的“社会活动和演讲词”，它展示了重庆公众视野中的郭沫若形象。郭沫若当时头衔甚多，不仅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在中苏文化协会、“文协”等组织任职，因此，经常要出席各类文化活动。而他的演讲也独具风格，在抗战的民众动员以及随后的民主运动中，都是一道文化风景，同时也是郭沫若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的独特方式。

但这部看似中立的历史资料集，实际上不乏政治“偏见”。既然题为“郭沫若在重庆”，郭沫若当时的主要身份，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但这一经历却毫不见记录。而为编者所选择的“寿郭”这一事件，本身便充满了政党政治的色彩，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亲自主持的这一场祝寿运动，本身就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共产党根据时局而拟定的新的左翼文化斗争方式之一，同时也成为奠定郭沫若左翼文坛祭酒地位的契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资料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研究的一种基本思路，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主要放置于共产党的党史框架之内叙述。可见，虽然是资料集，也是一种历史叙事。而延续这种资料的意识形态叙述的，是《〈屈原〉研究》[②]。它主要汇集的是当时评论界对话剧《屈原》的评论，以及当事人对这一文化事件的回忆，展示

① 可参考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② 曾健戎、王大明编：《〈屈原〉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5年。更早的则有黄中模编：《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左翼知识分子在“文艺战线”上的“共同战斗”历程[①]，从而将《屈原》完全纳入到了“左翼剧运”的历史叙述之中，郭沫若由此也顺利成长为周恩来领导下的文艺战士。不过，这种史料叙事的方式，本身也显示出郭沫若在新时期所遭遇的某种危机，这种危机也反应在郭沫若研究之中，即学界对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文化政治实践无法充分处理，只能通过资料整理这种较为中立的方式进行，因此，目前对抗战时期郭沫若的研究，成就最高的依旧是对史料的爬梳。

除郭沫若自传及研究者对史料的整理外，当事人的回忆也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不仅参与了郭沫若战时形象的还原与建构，也是郭沫若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如《悼念郭老》及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等，都是学界征引较多的资料。抗战时期，阳翰笙先担任第三厅的主任秘书，后又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郭沫若的左右手，《郭沫若在重庆》的序言也正是出自他之手。在《风雨五十年》中，他将郭沫若的战时经历描述成了党的文化工作者形象：“以郭老为首的第三厅，在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所加的种种限制和迫害，在极端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②] 从史实层面来看，他的回忆很大程度上参照的是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但不同的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天然地带有原罪感，需要不停地为自己的历史辩解，因而，阳翰笙也不得不将郭沫若当初曲折的用意，表达得更为明显，同时也部分地显得偏执和牵强。

阳翰笙这类说法，在80年代初期并不鲜见，更早的当属《悼念郭老》这部纪念文集。集中大部分文章都从既定立场出发，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叙述为党领导的文化人。如林林就回忆道，他在日本拜访即将归国的郭沫若时，对方就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③]。此说得到了夏衍的

① 荒煤：《永远闪光的雷电》，《〈屈原〉研究·序言》，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5年。

② 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③ 林林：《这是党喇叭的精神》，《悼念郭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4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